

俄國政治發展轉型之研究

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ussia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в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郭武平

摘要

關鍵詞：政治發展、政治文化、政治體制、沙皇、俄羅斯、蘇聯。

俄國歷來國家發展道路的方向，都在歷任國家領導人的主導下前行，在沙皇統治時期，君主專制體制延續千年。其後蘇聯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歷經七十多年，直到戈巴契夫上台後進行連串的政治體制「改造」，終止蘇聯一黨專政的局面，俄國的政治發展有了全新契機。俄國的政治發展有與其體制相適應的特殊歷史與政治文化存在，本文將由此觀點探討在俄國歷史的政治發展轉型期中，對俄國有過重大影響的數位國家主要領導人作為，做一扼要回顧與檢證。

ABSTRACT

Key wor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ystem, Tsar, Russia, Soviet Union.

The wa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Russia were directed by the leaders of country. The Empire of the Tsars controlled Russia under autocratic system. Then Communists controlled the country under one party and dictatorship over seventy years.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Russia have new change up to Gorbachev's policy of "Perestroika".

Whether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Russia have some adoption with their special histories and political cultu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d proves 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some important leaders of Russia.

Аннотац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царь, Росс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во всех областях проходило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Так, царский режим существовал в течение тысячи лет. Затем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70 лет страна находилась под властью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Новый толчо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России дала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когда у власти был М. Горбачёв.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проходит под влияниями многих внешних и внутренних факторов.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вопрос о том, какое влияние оказываю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лидеры России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ны.

壹、前言

研究俄國歷史會發現，俄國歷來國家發展的道路方向，幾乎都在歷任國家領導人的主導下前行。俄國在沙皇統治時期，君主專制體制延續千年，沙皇集行政、立法、司法權於一身，國家發展方向操諸於沙皇手中。其後的蘇聯在共產黨的統治下，70 餘年來其政治體制也有一特定模式，即：高度集權，以黨代政的領導體制；自上而下的幹部委派制與終身制；以人治代法治，缺乏有效的監督體制。在這種政治體制模式下，共黨的權力至高無上，其領導人常常也是國家元首。直到戈巴契夫上台後進行一連串的政治體制「改造」，於 1990 年修改憲法，允許共產黨以外的政治團體成立之後，蘇共一黨專政的局面告終，俄國的政治發展才有了新的契機，¹進入今日政黨政治的時代。

本文希望透過有限的篇幅，針對處於俄國政治發展²數次重大歷史轉型期，即有過重大變動的數個時期的國家主要領導人，做一扼要回顧與檢證。俄國的政治發展有與其體制相適應的特殊歷史與政治文化存在。俄羅斯民族的歷史是一個苦難史：基輔公國時，長期內戰，生靈塗炭；在韃靼入侵後，又和韃靼展開反壓迫的鬥爭；統治者藉改革之名，國家權力恆常膨脹；莫斯科公國的極權主義體制；混亂時期的分裂不安；彼得大帝的強制改革；俄國歷史中最可恥的農奴制；加上共產黨人的假未來共產世界之名，而行獨裁統治之實。千年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歷經不同形態的專制與極權統治，20 世紀末雖露出一道民主曙光，唯迄今人民仍生活在社會經濟惡化的陰影中。在俄羅斯民族這種特殊歷史命運過程中，孕育出俄羅斯民族特有的矛盾性：專制主義、國家至上和無政府主義；自由放縱殘忍、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順；信守宗教儀式和追求真理；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民族主義和普濟主義全人類性；默西亞的救世觀和表面的虔誠；信仰上帝和戰鬥的無神論；謙遜恭順和放肆無理；奴隸主義和造反行動。³而俄羅斯的政治文化即係從此歷史傳承而來。⁴

¹ 有關本文將提及的俄國政治發展幾個轉捩期之政治體制結構圖請參見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California, 1993), 及畢英賢主編，*俄羅斯*，p. 121。

² 政治發展概念請參見白魯洵(Lucian W. Pye) 與杭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觀點,見Lucian W. Pye,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Jason L. Finkle & Richard W. Gabl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NY: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1), pp. 43 ~ 51. 及 呂亞力，*政治發展與民主*，〈台北：五南圖書，1979〉，p. 53。

³ 參見雷永生，邱守娟譯，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著，*俄羅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北京：三聯書店，1995〉，p. 3。

⁴ 一般討論俄國的政治文化焦點常集中在以下幾個特點：

本文將從此一觀點來探討羅曼諾夫王朝時期三位具改革變遷代表性的沙皇，以及蘇聯時期迄今三位較具代表性的領導人，再綜合檢證這些國家領導人在俄國政治發展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檢證部分的重心並將以近 15 年來俄羅斯的政治發展為主，希望能對俄國的政治發展數次重要轉型期做一初步探討。⁵

貳、俄國政治發展的歷史

彼得大帝之西化改革

俄羅斯帝國的歷史，起於彼得大帝（Пётр Великий）西向擴張和遷都到波羅的海畔的聖彼得堡。遷都到聖彼得堡，象徵俄國向西方開啓了窗口，引進西方文明思潮的巨大轉變。⁶彼得大帝使俄國從落後的狀態朝向西化改革。他建立俄羅斯專主義體制，但也同時開啓了俄國歷史中無止盡的東西方文化衝突下，關於國家發展道路的爭議。

彼得大帝自 1696 年開始親政，在位期間長達 30 年，他帶給俄國的影響是全面性，並延續到後世。彼得大帝的改革遍及許多層面，在政治制度、經濟層面、社會結構、軍事建設、教育宗教思想各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其中許多變革涉及俄國本身的傳統風俗習慣，⁷在當時造成怨聲載道，民怨沸騰，但何以彼得甘冒改革風險，實施西化的政策？

-
- (1) 廣闊的土地但又偏處冰凍帶貧瘠的特性。
 - (2) 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民間的不能忍耐性。
 - (3) 救世主精神與自卑感的複雜情節。
 - (4) 大俄羅斯化和民族自決的衝突性。
 - (5) 東西方文化的衝擊爭議。
 - (6) 從無政府主義到專制政治的矛盾性。
 - (7) 統治階層與被統治者間的疏離。

參見 Gordon B. Smith, *Soviet Politics : Struggling with Change*, (NY: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 1-15.

⁵ 本文有關政治文化、政治發展、社會變遷及獨特的俄國政治文化內涵，另請參見郭武平，*社會變遷與俄羅斯政治發展模式的選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1998).

⁶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pp. 222-3.

⁷ 如下令人民禁止蓄鬚，但對篤信東正教的俄國人民來說，鬚鬚代表人格的完整，禁止蓄鬚違反傳統；更改俄人所穿著的寬袍大袖、高帽長靴傳統服飾，改以日耳曼式及荷蘭式的服裝等。

彼得即位時的俄國，由於受到拜占庭文化的影響和歷經蒙古長期統治的緣故，因此是一個充滿神秘宗教氣氛和東方色彩的國家。在攻佔亞速(Азов)之後的第二年(1697年)，彼得曾赴西歐考察，其西行的目的有三：一、為軍事上的目的。聯絡西歐國家與俄國締結同盟，組成對付土耳其的聯合陣線；二、考察西方國家的各項設施，作為今後施政之參考；三、延攬西歐各種專家以有助於俄國展開各項建設工作。對彼得來說，當時的俄國和西歐在相較之下，俄國顯然處於落後的狀態；因此有大刀闊斧推行改革的必要。

雖說彼得大帝的改革是因應國家的落後而產生，但事實上，為國家生存爭奪出海口，戰爭以及對外擴張的因素，在彼得改革的動機中佔了更重要的份量。⁸根據俄國知名歷史學家克流切夫斯基(Ключёвский В.О.)的統計，在彼得親政後的30年間，只有在1724年未發生戰爭，其餘的29年中，對外的戰事從未停止過。⁹因此，根據此一線索，不難解釋彼得選擇改革的動機；為了對外戰爭的勝利，帝國的政府組織必須走專制統治以強化中央權力，因而有行政機構的改革，在九個行政團外還有戰爭團與外交團的設立；財政稅務的改革乃是為了支應戰爭所需的龐大經費；經濟建設的改革是為了供應戰爭需要的兵器彈藥；軍事建設的改革是為了加強軍隊作戰的實力；宗教事務的改革是為了凝聚全國人民的向心力；實行新的政策必須用新人，為求刷新行政官員的素質，提高工作效率，所以有教育社會的改革。¹⁰

對彼得而言，他努力使俄國人民從無知和落後中解放出來，但在做法上，他卻訴諸無情的專制帝國主義的統治。¹¹故對當時的人而言，彼得有兩極的評價，有人認為他是超人，改變了俄國；但也有人認為他是破壞傳統者；甚至有人認為彼得在赴西歐考察時被「掉包」，取代他的是意圖顛覆俄國的日耳曼人。¹²而對其功過是非的爭論到150年後19世紀後期仍舊是爭議的焦點。自由派人士認為他是光明的鬥士，戰勝了黑暗；保守派人士稱讚他創造「政府」這個組織。但嚮往彼得改革前的俄國生活方式的舊信徒和親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人士，則認為他是傳統的反叛者及破壞者。¹³

⁸ 俄國處於內陸，自莫斯科公國時期開始，歷任君主無不處心積慮為謀取出海口，為俄國打通對外通道而努力。

⁹ Nicholas V.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51.

¹⁰ 詳見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pp. 235~257.

¹¹ Gordon B. Smith, *Soviet Politics: continuity and contradi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 9.

¹² С. Г. Пушкарев,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New York: Rausen Bros., 1965), p. 314.

¹³ Nicholas V.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p. 265.

綜觀彼得的西化政策，有謂其推行的改革操之過急、考慮欠周，祇是用「日耳曼人」的外衣將莫斯科的弱點及缺點遮掩起來。另一方面，上層社會急遽的西化，造成和人民大眾的脫節。¹⁴他的改革雖使俄國脫離落後狀態，一躍成爲歐洲強權，但西化的後果，同時也奠定往後俄國歷史中專制主義體制和無止盡的東西文化衝突爭議；正如涅瓦河一去不復返的滔滔江水，將屹立在涅瓦河畔的聖彼得堡帶入不可逆轉的歷史洪流中。

凱薩琳大帝的開明專制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前的世代，通常被稱爲「開明專制」(Просвещенный Абсолютизм) 時期。許多歐洲人渴望哲學家帝王 (Philosopher monarch) 的統治，期望他們以知識、美德與典範在政治、經濟和道德上提升人民。開明專制君王的目的在致力於啓蒙運動的文化，將理性知識運用到政府，並宣揚當時他們所仰慕的若干理想。¹⁵凱薩琳大帝 (Екатерина Великая) 爲當時標榜開明專制統治的君王之一，然而在她的統治之下，貴族的權利獲得完全的伸張，可說是「貴族的黃金時期」；另一方面，農奴的地位則惡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她的統治與她所標榜的開明專制原則是相互矛盾的，這對她無異是個極大的諷刺，何以她會制定如此矛盾的階級統治政策？

彼得大帝在大北方戰爭後，爲俄國開啓了對歐洲的窗口，而凱薩琳大帝則是爲俄國開啓了對歐洲的大門；凱薩琳大帝迫使歐洲承認強大而獨立的俄國存在，確立俄國爲歐洲一流強國的地位。1729 年，凱薩琳大帝於 1745 年與彼得三世 (Пётр III) 結婚。¹⁶然而婚後發現丈夫荒謬、可笑，如同嬰孩一般，只專注於玩具兵身上。¹⁷凱薩琳必須忍受丈夫的冷落，她同時還被懷疑是普魯士的間諜。在這樣的情況下，凱薩琳學會了如何在宮廷中求生存，她虔誠地成爲俄國東正教的信徒，認真地學習俄文，並且贏得大眾的好感。1757 年她曾告訴英國大使：「我要統治，不然我會死亡。」¹⁸之後，她也坦白地承認：「俄國的皇冠比他的人（指彼得三世）更吸引我。」¹⁹1762 年彼得三世退出 7 年戰爭，並放棄俄國的戰爭所得，失去民心，凱薩琳見時機成熟，即發動政變，強迫彼得三世退位。²⁰

¹⁴ С. Г. Пушкарев,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 315.

¹⁵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p. 289.

¹⁶ Крючевский В. О.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ва • "Мусл", 1983), сс. 198 - 201.

¹⁷ R. W. Harris, *Absolutism and Enlightenment, 1660-1789*, (New York : Harper & Row Publisher 1964), p. 238.

¹⁸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p. 276.

¹⁹ R. W. Harris, *Absolutism and Enlightenment, 1660-1789*, p. 238.

²⁰ 彼得三世退位數日後，其所住的別宮遭暴徒闖入，彼得在一場混亂中被殺，在極可疑的狀況下去世；一般相信是凱薩琳所主使的，雖然凱薩琳曾一再否認。參見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在即位之初權力尚未鞏固的情形下，她了解到一個事實：她是個外國人，先前曾還被懷疑是普魯士的間諜，而她只有一小部分貴族擁護，權力並不穩固；而假如政變能那麼容易發生的話，那政變也能同樣地再發生一次。²¹傳統上，俄國自基輔公國時期開始，貴族一直是和大公共同統治。按韋伯的觀點，一個政權取得並維護其統治權威，有三種類型：一是傳統性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一是人格性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另一是法理性權威（Legal Rational Authority）。²²初始凱薩琳既無特殊的人格吸引力，在法統上亦非王位既定的繼承者，所以她必須採取行動以穩固她的權力。俄羅斯的貴族起源於與當初和柳瑞克（Рюрик）大公入主基輔，而後和大公一起「索貢巡行」的衛士，²³在傳統上，貴族所代表的是大公共治的夥伴。凱薩琳為鞏固自己的權位，自然必須拉攏貴族來表示她的政權是合法的。

在她統治期間所召開的立法會議（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ая Комисия），號召了來自俄國社會各個階層，是為將俄國當時的法律，不合時宜的加以修訂或廢除。立法會議正足以代表凱薩琳一向所標榜的開明專制形象，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立法會議的召開其實也是讓對凱薩琳不滿的貴族有發洩不滿的公開場合，使其不致於有爆發革命的可能。²⁴凱薩琳為鞏固自己的權力，只有犧牲農民的利益來滿足貴族的要求，以致於有普加喬夫（Емельян Пугачев）之亂——這場足以動搖俄羅斯帝國的根本上叛亂發生，凱薩琳的政治選擇與普加喬夫之亂正描寫了俄國政治文化中專制主義與民間的不能容忍性，也是統治階層與被統治者之間疏離的寫照。凱薩琳在面臨了開明專制與鞏固政權上的考量後，最後仍是向貴族讓步。凱薩琳對貴族與農奴差距拉大的階級政策，目的在拉攏貴族以鞏固自己的權力，而農奴則成為她鞏固權力的犧牲品，在農奴政策後面所得利的是既得利益者——貴族階級，貴族的利益和政治的穩定是結合在一起的。凱薩琳在位時農奴制度達最高峰，農奴問題表面上似乎已得到解決，但實際上是羅曼諾夫王朝政權潛在的危機。

亞歷山大大的大改革時代

亞歷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在位期間，被後人稱為「大改革時代」(Эпоха Великих Реформ)，他本人也有「解放者沙皇」之稱，原因在於亞歷山大二世這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p. 275.

²¹ R. W. Harris, *Absolutism and Enlightenment, 1660-1789*, p. 239.

²² 馬康莊、陳信木譯，George Ritzer 著，*社會學理論*，〈台北：巨流，1989〉，p. 204-254。

²³ 柳瑞克入主基輔的歷史在俄國史中一直備受爭議，可參閱賀允宜著「俄羅斯開國源流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12，(May, 1995)，p. 267-287。

²⁴ Paul Duke,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the Russian No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48-9.

26 年的統治期間，俄國有一連串的改革，但最重要的是亞歷山大二世的農奴解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Крестьян）。農奴向來是俄國經濟的支柱，但是對貴族而言，解放農奴勢必會影響到他們的利益，若以金字塔的架構來形容俄羅斯帝國的話，農奴就是在最底層的一群，在他們上面的就是貴族，最上頭的則是沙皇，這種充滿矛盾的社會結構，等到亞歷山大二世解放了農奴，同時也改變了整個俄羅斯帝國的組成結構。

亞歷山大二世即位時正是農民暴動頻繁，克里米亞戰爭進行的如火如荼之際，隨著 1856 年 3 月巴黎和約的簽訂，克里米亞戰爭也告一段落。克里米亞一役的失利讓俄國損失慘重，同時俄國在歐洲的強國地位也受到挑戰，使得俄國全國上下一致認為必須從事改革，否則俄國將無法繼續維持歐洲大國的地位。

然而俄羅斯帝國的基礎在於農奴，任何改革到了最後必定會牽涉到農奴制度問題，勢必要解放農奴才能獲得解決。早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前，就有知識份子鼓吹解放農奴，如赫爾岑（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就主張給予農民土地，解放農奴，他認為給予農民土地，對地主並不會造成損失，因為農民必須付一筆補償費。

25

所以只要農奴制度存在，軍隊就無法改革，工業就無法發展，但解放農奴將會出現其他難題，問題的解決就像農奴制本身那樣複雜。解放農奴將使貴族免除對將近兩千萬名農民徵稅、徵兵與主持司法的責任。只要沙皇批准解放令，這些責任都將移轉至政府，但當時並無適當的機構能將這些新公民統合到俄國國家生活裡。帝國財庫瀕臨破產，也無力融資釋放農奴。²⁶

但亞歷山大二世意識到根本加以改革的必要，並且必須實現。1856 年巴黎和約簽訂後，亞歷山大二世在莫斯科與貴族代表會談，宣佈他解放農奴的打算，同時留下了一句名言：「由上面來廢除農奴制度，總比等到他們自己由下面來取消的好…」²⁷，並開始著手農奴解放的工作，幾經波折，最後才在 1861 年 1 月，亞歷山大二世召開國務會議做最後的檢討，3 月 15 日正式頒布此一解放令。存在俄國數個世紀的農奴制度終於廢除。

亞歷山大二世廢除農奴制度的原因正如其父尼古拉一世所說的：「由我們主動放棄農奴，總比等到他們從我們這裡取走的好…」²⁸，因為當時俄國在克里米亞

²⁵ Terence Emmons , *The Russian Landed Century and the Peasant Emancipation of 1861*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68), p. 244.

²⁶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 *A History of Russia ,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 pp. 408 -9.

²⁷ С. Г. Пушкарев,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 401.

²⁸ Jesse D. Clarkson, *A History of Russia*, (U.S.A: Random House, 1964, Four printing), p. 294.

戰敗的陰影下，幾乎是全國一致贊成廢除農奴制度，亞歷山大二世在如此重大的壓力之下，除了實施改革以外，別無他途可循，所以農奴解放令可說是亞歷山大二世在出於無奈的情況下所簽署。

表面上，俄國農民不僅獲得了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而且還配給了土地，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農民所獲得的土地較以往來得少，經濟負擔也較以往來得重，同時為繳交土地補償費，農民不能自由移動，在形式上，農民是被解放了，但實質上，他們依然是遭到禁錮，而且生活得更苦。這就是又要廢除農奴和又擔心造反兩種概念衝突妥協下的產物。

農奴解放後，俄國舊有的社會結構產生變動，貴族雖然保持了他們大部分的物質利益與政治地位，但他們的特權則開始動搖，逐漸沒落。而大力鼓吹解放農奴的知識份子，在農奴解放後繼續追求改造整個社會國家，由虛無主義轉向民粹主義，最後在失望中投向恐怖主義，轉而採取恐怖行動暗殺沙皇，意圖喚起人民，製造革命；亞歷山大二世在 1881 年遭到暗殺，然而此一舉動卻使得知識份子更加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80 年代的知識份子受挫於民粹主義的失敗與幻滅，於是轉而追求一套能夠解釋紊亂的新理論，馬克思主義（Марксизм）在此時提供了他們答案²⁹，往後影響與主導了俄國近一個世紀之久。

亞歷山大解放農奴後，也同時對教育、地方自治、司法、軍事等方面進行改革。教育普及結果，輿論發展迅速，人人平等觀念，在地方自治、司法、社會經濟等層面發展結果，削弱了專制政治。俄國從封建社會轉變到資本主義社會，但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在沙皇政權維護貴族與資產階級利益下，致使初始走向自由改革，而其後卻停止或倒退。甚至於其後在亞歷山大遇刺前，他為了維持統治權力，而阻撓國會的成立與憲法的制訂，使其解放農奴的大改革，有頭無尾，對整體國家政治發展而言，呈現倒退現象。³⁰

列寧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²⁹ 1881 年亞歷山大二世被暗殺後，馬克思在 1882 年的 共產黨宣言 俄文版序中提到，若俄國舊有農社中的資本主義成分能消除，無產階級革命能在西歐爆發，俄國必能避開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直接過渡到更高度的土地佔有形式，即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土地佔有形式，欲了解詳細內容，請參考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4, p. 124. 知識份子們在意圖以恐怖暗殺行動喚起農民的革命意識失敗後，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對困惑的知識份子極具吸引力，在俄國也開始結合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

³⁰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pp. 393- 402.

蘇聯（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得以建立和列寧（Ленин В. И.）的職業革命家黨（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與無產階級專政掌控政權，推動社會主義建設關係密切。³¹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軍事失利，經濟崩潰，政府癱瘓，在 1917 年爆發了二月革命，沙皇退位，臨時政府（Времен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成立，準備召開立憲會議，走向民主政治，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當時的民眾基礎並不穩固，勢力也不足以和臨時政府抗衡。布爾什維克黨能在最後關頭反敗為勝，可能要歸功於列寧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1917 年俄國爆發二月革命，在俄國實行達千年之久的帝制為人民所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代表自由份子與中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在臨時政府成立的同時，另一批工人與士兵代表也成立了代表勞工無產階級勢力的蘇維埃（Совет），此時俄國出現了「雙重權力」（Двоевластие）。

二月革命爆發後，列寧在德國協助下回到俄國後，便提出「四月提綱」（Апрельские Тезисы），喊出著名的「土地、麵包、和平」與「一切權力歸蘇維埃」（Вся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м）等口號，這些口號切中當時俄國的民心。由於長期的戰爭使得士兵們普遍厭戰，而農民更想擁有自己的耕地，使得布爾什維克黨的支持群眾扶搖直上，「一切權力回歸蘇維埃」則爭取到了工人與士兵的支持。九月底十月初，列寧在給布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強調：「危機成熟了，俄國革命前途就在決定關頭」「等待就是對革命犯罪」³²，要布黨全面準備發動革命奪權戰爭。

俄舊曆 10 月 25 日，布爾什維克黨的分遣隊在托洛茨基（Троцкий Л. Д.）的率領下，發動攻勢，臨時政府毫無招架抵抗的能力，一天之內，俄國的統治權即落入布爾什維克黨的手中。26 日當晚，蘇維埃大會在列寧的控制下，批准了兩個法案：「和平法案」（Декрет о Мире）、「土地法案」（Декрет о Земле），這兩個法案均切合了人民的需要。³³「和平法案」建議所有交戰的民族與其政府立即開始談判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不兼併、不索賠；同時俄國反對秘密外交，並公開先前秘密條約的內容。列寧認為聲明有可能挑起全面的和平談判，進而可能引起整個歐洲的革命戰爭；這也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所相信的。

不過，列強忽視列寧的訴求，以致列寧為保政權，被迫於 1918 年 3 月 3 日在德國最後通牒下簽訂布瑞斯特-里脫夫斯克條約（Буест-Литовский

³¹ 參閱列寧，「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24 列寧全集，p. 3。

³² 列寧，32 列寧全集，（北京：新華書店，1957），p.275-334。

³³ 布爾什維克黨與臨時政府間的鬥爭過程，Nicholas V. Riasanovsky 的 *A History of Russia* 中有詳細的描述，參見 pp. 505 ~ 512.

Договор)。條約的簽訂使俄國總人口損失 26%，農地損失 27%，農產品損失 32%，鐵路系統損失 26%，製造業損失 33%，鐵工業損失 73%，煤田損失 75%，³⁴這項割地賠款條約對俄國來說是喪權辱國的，但是在當時對布爾什維克黨政權有利，當然這也是在列寧主導堅持下所簽訂的為保政權之不平等條約。

一次大戰後期，聯軍對蘇維埃政權違背協議獨自停戰，早已感到不滿，後來蘇維埃政權將帝俄與聯軍的密約公佈，更使聯軍深惡痛絕。德國尚未投降前，英法等國為牽制德軍勢力，必須重開東線戰場，要重開東線戰場，就必須支持俄國內的反共勢力；1918 年 11 月德軍投降後，西方國家擔心共產主義在俄國紮根，進一步掀起世界革命波及西方各國³⁵，因此也希望蘇維埃政權早日被推翻。在種種因素的交錯影響之下，俄國的內戰滲入了西方列強的勢力。

為了實現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理想以及對抗國內與國外的反對勢力，列寧高唱無產階級專政，他運用手中一黨專政的力量推動「戰時共產主義」（**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的激烈措施，他成立秘密警察（**Ч.К.**），專責對付異己份子，他成立貧農委員會，專責面對廣大農民，強徵國內的剩餘糧食與物資運送給紅軍，以渡過當時的難關。³⁶

列寧對此認為這是一大功勞，他說：「戰時共產主義就是：我們實際上從農民手裏拿來了全部餘糧，…。我們當時不這樣就不能在這經濟破壞的小農國家內戰勝地主和資本家。…應當說我們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勞。」³⁷然而，實際執行時，由於攤派指標高，征收任務重，常常用對待富農的辦法來對待中農。農民的全部餘糧甚至口糧和其他剩餘農業品被一概強行征收，不但收購價格很低，而且所付的紙幣都是一些急速貶值的「彩色紙片」，這近乎是無償地剝削農

³⁴ 條約的簽訂使俄國總人口損失 26%，農地損失 17%，農產品損失 32%，鐵路系統損失 26%，製造業損失 33%，鐵工業損失 73%，煤田損失 75%，見 Nicholas V.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p. 529.

³⁵ 列寧認為：俄國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俄國共產就是世界革命的核心，蘇維埃制度將適合世界上任何一塊國土，成為人類社會的最佳形式，全歐洲人類都將共產主義化，一切落後的民族問題都會因世界革命的實施迎刃而解。（段家鋒，*馬列主義世界革命運動概觀*，〈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2，p. 180〉。）在這方面，列寧的觀點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不謀而合，欲了解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可參考林驥華、伊陽明、范毓民等所合譯的*不斷革命論*（台北：時報文化，1991）。

³⁶ 戰時共產主義的主要措施還有：一、實行餘糧收集制；二、加快工業國有化步伐、建立管理總局體制；三、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四、取消自由貿易，經濟關係的實物化，其中最重、影響也最大的就是餘糧收集制，1918 年 6 月 11 日「貧農委員會」成立，將階級鬥爭帶入農村。

³⁷ 列寧，32 *列寧全集*，頁 333。

民。³⁸如此剝削農民的結果當然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採取不合作或是消極抵抗的態度。餘糧收集制的實行，後來在坦包夫（Тамбов）和克隆斯塔特（Кронштадт）海軍要塞分別爆發農民暴動與士兵叛變。³⁹

這兩次叛亂對蘇維埃政府是一項嚴重的警訊，以致於列寧在後來改以實行戰略性退卻的新經濟政策（НЭП）。戰時共產主義事實上是一項錯誤的決策，事後列寧本人也承認：「當時我們認定：農民按照餘糧收集制會交出我們所需數量的糧食，而我們把這些糧食分配給各個工廠，我們就可以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與分配了。…經過一段不很長的試驗時期終於使我們相信，這種想法是錯誤的，…」⁴⁰。

1921 年在蘇維埃政權發展初期是一個重要的年代。蘇維埃政權雖然僥倖渡過難關，然而在面前的是一幅凋零破碎的社會。為改善國內的社會經濟，列寧在共黨專攻下採取了「新經濟政策」，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進程。首先，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和多種經濟形式的並存。租讓制法令，是把國家暫時無力經營的大企業、礦藏、森林、鐵路等以租讓的形式租給外國資本家。原本沒收的中小型企業，採取租借形式租給私人經營，一部分小工廠還給了私人，允許發展私有企業。其次是調整工業管理體系，適當擴大地方和企業的權力。第三是實行工業的托拉斯和辛迪加化，按照經濟核算制的原則，將企業聯合起來，建立大型的中央托拉斯或地方的托拉斯。

然而，這項措施遭到黨內純理論派的強烈反對，原因在於新經濟政策實際上等於是回復到資本主義，這點連列寧自己也承認：「新經濟政策就是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轉到恢復資本主義。…同外國資本家訂立的租借合同，和私人資本家的租借，都是直接恢復資本主義，…」⁴¹，但是列寧對黨內的強烈反對卻極力辯護，他說：「我們的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正在於我們在這方面遭受了嚴重的失敗，開始作戰略上的退卻，趁我們還沒有徹底被打垮的時候，讓我們實行退卻，重新安排一切並安排得更牢靠一些吧。」⁴²

在十月革命成功後，俄國原有機會邁向君主立憲之路卻因而終止。其後列寧推動戰時共產主義、對德簽訂和約和新經濟政策，其實踐力量幾乎可說是來自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與職業革命家黨的理論。這些理論其後並被史達林發揚光大，加速蘇聯走上一黨專政體制道路。之後，基本上蘇聯是在共產黨一黨專

³⁸ 周尙文、葉書宗、王斯德等著，*蘇聯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p. 52。

³⁹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pp. 572.

⁴⁰ 列寧，33 *列寧全集*，p. 43。

⁴¹ 列寧，33 *列寧全集*，p. 45。

⁴² 列寧，33 *列寧全集*，p. 44。

政政治體制下，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從史達林堅持一國社會主義與發展重工業，透過極權獨裁與大整肅方式來達成他的政治理念是一模式。其後，赫魯雪夫從「鞭史」來反對個人崇拜，並高唱「全民國家」與「全民黨」，但是卻從集體領導又回歸一人獨裁，最後終不敵反對力量而黯然下台。布里茲涅夫保守型的老人政治，雖然能安撫不同的政治力量，但是國家社會發展卻呈停滯狀態。累積下的弊病到了戈巴契夫時成了山洪，一發而不可收拾。

戈巴契夫推動「改造」工作

1985 年戈巴契夫(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上台之前，國家內部已面臨政治、經濟、社會巨大變遷危機，外部也遭逢前所未有的西方發展壓力，加上其後東歐共黨國家的巨變以及國際共黨運動的沒落。對戈氏而言，國家發展道路的變革已箭在弦上。

無論在蘇聯或整個共產黨內部，戈巴契夫皆非第一個從事改造的人。但翻開蘇聯的改革史，我們發現經濟改革是多數共黨領袖改革的重心，但卻鮮少有成功的案例，癥結之點乃在於缺乏配套的政治改革。蘇聯政治制度自共黨革命成功至戈巴契夫上台期間雖經歷了 1918 年、1924 年、1936 年及 1977 年數次新憲法制訂，但只是修正枝節的問題，未能解決體制中一黨專政的核心問題。⁴³戈氏上台時，由於時代和社會整個大環境的改變，迫使政治體制也面臨變革的考驗。⁴⁴

戈巴契夫在其所著的『改造與新思維』一書中，開宗明義就強調「改造」(Перестройка)並不是一時興起的念頭，而是緣起於蘇聯社會主義社會中複雜的發展過程。他談到：「『改造』是一項急迫的需要，它緣起於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裡複雜的發展過程之中。這個社會已成熟到需要改變的時機，它已長期地有此渴望。倘若延遲改造，便將在不久的未來，導致內部情勢的惡化。率直的說，那便是充滿著嚴重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危機。」⁴⁵戈巴契夫勾畫出的這個結論，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話來歸結其改造之歷史結構——「我們沒有選擇」(戈巴契夫語錄)；換句話說，整體的歷史條件與政治經濟之現實，迫使戈巴契夫不得不從事這樣的改造，即使不是他上台，其他人仍須從事這樣的改造，只是手法與形象不一樣罷了。

⁴³ 關素質，*蘇俄黨政演變之評析*（下冊），〈台北：黎明文化，1973〉，p. 336。

⁴⁴ 參見郭武平，*論戈巴契夫的「改造」理論與實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

⁴⁵ Михаил С Горбачёв ,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7), с. 11.

在改造的十字路口上，如果說戈巴契夫的「改造」無意要超過馬列主義而重新要塑造另一套意識型態，這可能低估了戈氏。因為長期以來，蘇聯的官方意識型態是史達林所詮釋的「馬列主義」，而戈氏特別強調人道的社會主義，恢復人的尊嚴，使人民成爲歷史、國家的真正主人。也就是說，戈氏仍然相信社會主義作爲追求人類社會正義、公平有其終極意義，但是這套新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已不是馬列主義意義下的意識型態。而是一套嶄新的戈巴契夫的意識型態了。而觀諸歷任共黨領導人上台之後第一件事即是塑造屬於自己的意識型態⁴⁶，這似是共黨國家不可避免的規律。當然，一套意識型態的形成所需的時間可能不是 3、5 年的事，雖然其後繼者葉爾欽對社會主義者心態，堅持社會主義價值觀與全人類的價值觀不予認同。⁴⁷但從戈氏所提「改造」理念看來，其宏圖偉略自有其獨特社會主義特色，其特徵有：

- 〈一〉表面上，戈氏的意識型態仍沿用馬列主義術語，但其範圍已非馬列主義所能規範。諸如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引進、共產世界主義的放棄等。
- 〈二〉「改造」理念的意識型態所強調的仍是社會主義的理想，在戈氏的言論中還是一再地強調「社會主義的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只是此社會主義是戈氏所理解的社會主義，而非馬克思或列寧、史達林所理解的社會主義。
- 〈三〉戈氏處處強調世界安全與合作，一反蘇聯以往領導人的馬列主義世界觀，尤其對東歐國家而言，放棄布里茲涅夫的「有限主權論」，對歐美國家提出結束冷戰與核武競賽，對世界的影響更爲深遠。

⁴⁶ Sylvia Woodby, *Gorbachev and the Decline of Ideology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Boulder, San Francisco &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9), p. 8. 如列寧在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史達林於 193 年宣布：我們社會基本上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就是說，我們基本上已完成了社會主義第一階段的任務。當赫魯雪夫上台後，就提出了蘇聯社會基本上已到了成熟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觀點。布里茲涅夫上台後，又提出已發達社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到了 70 年代及 80 年代初期，蘇聯經濟發展持續下降，原蘇共綱領規定到 1980 年勞動生產力超過美國的任務成爲幻影，這種落後的情勢，促使蘇聯重新評估布里茲涅夫的理論正確性。1982 年安得洛波夫在「列寧主義是群眾革命力量和創造力取之不盡的泉源」報告中，把布里茲涅夫的發達社會理論修正爲「發達社會主義起點論」。起點論認爲蘇聯雖已進入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但僅「處在這一發達階段的起點」。契爾年科任職的一年多期間內，繼承安得洛波夫的起點論，並進一步論證。契爾年科認爲：「完善發達社會主義起點論構成一整個歷史時代，這個時代具有自己的各階段、任務和時期」。換句話說，發達社會主義也有一個由低到高的過程。戈巴契夫即位後，揚棄「成熟社會主義社會」、「已發達社會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起點論」，而提出「完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中的社會主義」，企圖繼續完成列寧革命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構想」。

⁴⁷ А.С.Черняев,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Прогресс"), с. 473.

〈四〉在蘇聯國內強調「新思維」(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民主化」(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公開」(Гласность)等「改造」理念，企圖改造蘇聯的共產集權的體質，這對蘇聯而言，更是一項創新而大膽的革命性作為。

在戈巴契夫的推動下，政治體制的改造包括：

〈一〉黨的改造：

1985年10月，戈巴契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要進一步擴大黨內民主，發揮共產黨員、所有黨組織，首先是基層黨組織的主動性和積極性。」1986年3月27日通過的「蘇共綱領新修訂本」更指出，要在「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基礎上完善黨內關係」，強調發展社會主義人民自治理念。⁴⁸從此戈氏就相當重視黨內的民主化問題。戈氏認為黨是「政治領導機構」，要放棄「管理職能」，「黨實施政治領導確定總的發展前景，制定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和精神生活領域的主要任務，負責幹部的選拔和總的監督」，但是黨不應「把一切都抓在手裡」，要放棄「調度職能」，「管理工作、經營工作應當由國家機關和其他主管此類事務的單位去做。」⁴⁹戈氏在此已開始強調黨政分離。

1989年間，東歐共黨紛紛放棄一黨專政，促使蘇共積極改革。1990年3月在戈氏推動下，修改憲法第六條共黨一黨專政條文，展開政黨政治新頁。甚至在28大之後，整個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權力，轉移到總統戈巴契夫和由其親信所組成的「總統委員會」組織。

〈二〉政治體制的改造

戈巴契夫政治改革過程中，不但牽動了民眾政治參與的意識，同時也改變了民眾參與的程度、參與的性質和方式。根據阿爾蒙對政治文化的分類，蘇聯在戈巴契夫時期的政治文化係屬漸由臣屬的政治文化轉向參與的政治文化。基本上共黨的政治文化是臣屬高於參與的型態，一方面一黨專政下要人民絕對服從，另一方面在執行的過程中又要求全程的參與。戈巴契夫上台後，在其開放改革的政策下，大力提倡「民主化」、「公開化」，放棄一黨專政的結果，共黨權威削弱，強調民主是一較高程度的秩序，是基於人民全面參與政治事物而形成的結果。由於戈巴契夫在加深社會民主、發展人民自治方面提出很多構想，使人民知道如何對政府提出要求，同時知道政治過程變遷的感覺。這種積極、主動的政治角色扮演

⁴⁸ Правда, Окт. 3, 1986, с. 1.

⁴⁹ А.С.Черняев,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с. 240 -2.

的取向頻率增高，正足以說明蘇聯的政治文化正處於一個變遷階段，即參與的政治文化正逐漸顯現。

戈巴契夫的改造理念落實在政治體制上，主要的有最高蘇維埃的改制。複數選舉制的開創及總統制的設立。其中選舉制度的改革，確實在擴大政治參與上有重大貢獻，但是距離政黨政治的政治多元化還有一大段距離。候選人雖然依法可以提出政見，但都是個人的主張，不易在進入國會後加以落實，形成整體的決策。缺乏政黨政治的運作，選舉制度也就失去了實質的意義。另外，憲法第六條一黨專政條文的修改的確是政治發展上創時代的轉變。它結束蘇共一黨專政的時代，邁向多黨體制過渡。

在戈巴契夫推動改造的過程中，內政上有關黨、政、社會和經濟的「改造」成果，遠遠不及外交上的「改造」成果，當其當選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國外聲望如日中天之際，⁵⁰國內聲望卻日益低落，1991年6月，俄羅斯首次舉行大選，經由他所推舉參選俄羅斯總統的候選人，得票率卻遠低於葉爾欽。隨著「改造」道路的選擇，在「八月政變」之後，⁵¹蘇聯突然在一夕之間解體。從以上戈巴契夫對政治發展的實踐觀之，由於社會經濟改造步伐遠落於政治之後，當戈氏手中缺乏「改造」所需黨政大權，保守派與激進改革派又雙面夾殺反對戈氏，自然不利於其改造工作。歷史是一連串偶然和必然的結果，然而，如果沒有戈巴契夫的「改造」，前述改革展開的腳步將會遲緩些。較之蘇聯過去的社會主義改革史，以及安德洛波夫執政後改革措施的停滯不前，戈巴契夫所選擇的「改造」方向，雖然結果引致蘇聯解體，但是對俄羅斯今日政治發展仍具有其一定地位。

葉爾欽民主之父暨沙皇總統

俄羅斯社會經歷東正教的洗禮，彼得大帝西化、共黨大革命以及蘇聯解體的重大變遷。到葉爾欽(Борис Ельцин)時，他繼承了過去的蘇聯，從過去蘇聯是由共產黨人以無產階級專政形式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試圖走向西方民主的政黨政治與自由市場經濟道路。他是如何承續俄羅斯的政治發展，首先要從葉爾欽的政治發展觀念來看。

1990年7月12日，葉爾欽在蘇共28大上發表退出蘇聯共產黨的聲明。葉爾欽表示，由於已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和對俄羅斯人民所承擔的巨大責任，因此他無法只執行蘇共的決策，身為共和國最高立法機關首腦，應當服從

⁵⁰ Michael Kort, *The Soviet Colossu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SSR*, 3rd ed., (New York: M.E. Sharpe, 1993), p. 323.

⁵¹ 八月政變一事參見郭武平，論戈巴契夫的「改造」理論與實踐。

人民和人民全權代表的意志。因此根據其競選前的承諾，並為了有更多機會能有效地影響蘇維埃的活動，以及與共和國一切政黨和社會團體組織合作，正式宣佈退出蘇共，並向多黨制過渡。⁵²

1991年6月12日，葉爾欽參與第一屆的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並當選。1991年8月舉世震驚的「八月政變」之後，8月29日葉爾欽總統在俄羅斯電台發表廣播講話指出：國內形勢在粉碎叛變之後的這些日子裏發生根本的變化。權力的主要槓桿從幾十年來控制國家的那些勢力的手中丟失。原先堅固的黨的機關、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機關和實現這些機關意志的那些國家機關即將垮台。但中心的垮台並不是國家的垮台，更不是俄羅斯的垮台。黨和黨的結構主宰一切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消除政變之後，俄羅斯國內實際上已開始一過渡時期。從壟斷國家結構走向市場，從官僚主義機關主宰一切和不受控制走向民主、從蘇共的意識型態強制走向精神自由，從一元化最集中的社會走向主權國家自由聯盟的運動業已開始。⁵³

同年12月7日葉爾欽與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Леонид Клавчѐк）、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蘇什克維奇（Шушкевич С.С.）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Минск）簽署組成獨立國協（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НГ），宣佈蘇聯不復存在。⁵⁴其後，陸續共有十一個加盟共和國在哈薩克首府阿拉木圖簽署「阿拉木圖宣言」。⁵⁵至此，戈巴契夫見大勢已去，被迫於1991年12月26日發表辭職演說，蘇聯隨之宣告瓦解。

隨著蘇聯的瓦解和俄羅斯成為獨立的國家實體以後，葉爾欽總統組成的新政府在西方的支持下，從1992年1月2日開始實行激進的經濟改革。希望藉由全面開放物價和大規模私有化，在短期內達到消費市場平衡、財政穩定、制止生產下降和為市場調節提供場所的目的。但這種被稱為「震撼療法」（Шоковая Терапия）的改革並未達到預期的結果，反而使整個經濟形勢逐漸惡化。

由於俄羅斯保守派希望在蘇聯解體後，藉由原來的舊憲法，箝制葉爾欽總統的行爲；另一方面，就葉爾欽而言，希望重擬出一部強化行政權力、貫徹其政策命令執行，並以總統至上的俄羅斯憲法。國家體制的問題遂成為府會雙方的爭執所在。而以哈斯布拉托夫（Руслан Хасбулатов）為主的陣營反對總統制，主張限制總統權力建立立法權至上的議會制。葉爾欽陣營則主張擴大總統權力，建立西方式的總統制，以便總統有權強化各項改革政令的施行。因此，以總統葉

⁵² Правда, июль 13, 1990, p. 1.

⁵³ 辛燦，「八一九」事變後的蘇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p. 39。

⁵⁴ Правда, Окт. 10, 1991, с. 1.

⁵⁵ Правда, Окт. 22, 1991, с. 1.

爾欽為首的憲法委員會和以哈斯布拉托夫為首的最高蘇維埃就成為俄羅斯聯邦制憲過程中的兩大陣營。

議會與總統之間的權力之爭，於 93 年 7、8 月達到白熱化程度。當時葉爾欽利用總統的權力公然宣佈解散議會，議會針鋒相對，做出撤銷葉爾欽總統職務的決定，並任命副總統魯茲柯伊（Александр Руцкой）擔任代總統行使國家元首職權，從而在俄羅斯出現了「雙重政權」，最後導致葉爾欽使用武力平息議會的武裝叛亂，即「十月事件」。緊接著葉爾欽以全民投票於 1993 年 12 月 12 日舉行新的議會選舉，同時通過新憲法，成為俄羅斯史上第一部公投通過的憲法。⁵⁶

在俄羅斯聯邦總統制下，總統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總統為國家元首，並擁有許多權力，如監督憲法的遵守，採取措施以保證國家權力的正常行使；解散國家杜馬；決定舉行全民公決等。俄羅斯聯邦總統不兼任政府首腦，但政府總理和其他成員由總統按法定程序任免，政府會議也由總統主持，政府活動實際上由總統控制。在國家杜馬對政府表示不信任後，總統可宣佈政府辭職或解散國家杜馬，但總統不辭職。由此可見，俄羅斯聯邦總統制既保留了政府對議會負責的形式，又賦與俄羅斯聯邦總統比美法總統制更大的權力。如俄羅斯聯邦總統獨立做出解散國家杜馬的決定，不需同總理及議會兩院議長磋商；總統發佈的命令，也不需總理或有關部長副署；有權決定國內外政策的基本方針；憲法所賦予權力，似只差一頂沙皇皇冠。⁵⁷

從俄羅斯國家杜馬在 1993 年和 1995 年的選舉結果來看，93 年右翼的自由民主黨和九五年的左翼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獲勝，似乎是暗示俄羅斯將會恢復前蘇聯的政策，國家發展道路又要來一次大轉變。事實上，兩次大選中個別政黨所獲得的議席，最多只佔全部議席的 1/3 強。任何一個政黨的提案要在國會得到多數通過，都要與其他黨派聯合才能通過，這就使得葉爾欽總統利用憲法對國家杜馬的決議有否決權，而議會對總統投不信任票則須有 2/3 的多數才能通過的規定，勉強維持政治運作。但是基本上，從 1993 年和 1995 年兩次杜馬選舉來看，反對黨勢力已然形成，俄羅斯的政黨政治發展也更趨穩定。

1996 年 6 月 16 日，俄羅斯舉行第二屆的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時，葉爾欽僅得 34% 選票，無一位候選人獲得過半票數。第二輪選舉時，葉爾欽就拉攏第 3 高票的列別德（Александр И. Лебедь）結成競選聯盟，第二輪投票葉爾欽的得票率始過半，達 53.82%，順利連任。⁵⁸

⁵⁶ Известия, Окт. 14, 1993, p. 1.

⁵⁷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四章，參見畢英賢主編，*俄羅斯*（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4），p. 467-473。

⁵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Июль 10, 1996, с. 1.

1996 年總統大選的結果，對一般選民來說，確實是一困難選擇。他們對當權的改革派領袖葉爾欽有許多不滿和怨恨，而對共產黨人朱岡諾夫（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又存有相當大的疑慮和戒心。選舉結果再次證明 1994 年以來形成的一種政治現實：左右兩翼逐漸向中間靠攏的同時，左右翼力量又勢均力敵，決定勝負的即是中間力量的選擇，而這股中間力量其後便在 1999 年底的杜馬選舉中，再度集結發揮決定性作用。

由於俄羅斯同時推動政治與社會經濟的改革工作，在過渡時期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因此俄羅斯人在投票行為上表現出被迫選擇威權政體。然而他們並不喜歡以葉爾欽的無能政府為代表的威權體制，而是期望一個在所有社會生活的範疇內都能扮演建設性角色的有為政府。在由全俄羅斯民意研究中心（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е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於 1996 年與 1997 年所做的調查報告中顯示，80% 的受訪者已準備用某些政治自由來換取一強有力的國家；大約半數的人寧願選擇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只有 1/3 的人願意選擇西方模式。雖然西方國家仍認為繼續維持葉爾欽的政府是最好的選擇。從某些程度來說，西方卻不能不注意到克里姆林宮的傳統的專制主義以及企業家與犯罪集團掛勾的事實。⁵⁹1998 年 2 月，葉爾欽民調支持度僅 2.4%，⁶⁰致其後數度連續撤換內閣改組政府，致瀕生政治信仰危機。這些都一再呈現出俄國人民持有矛盾性，即對無政府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矛盾心態。

葉爾欽雖然讓俄羅斯走上民主的政黨政治之路，並博得「民主之父」令譽，但是他選擇將總統權力強化擴張，使得總統與內閣總理權力劃分變得模糊、行政組織的結構分歧，其結果導致政治運作混亂無章。葉爾欽在新憲法架構下，自認具有法理性權威，竟像一個騎士一般，不顧一切地往前衝。結果與民意愈走愈遠，人民用選票表達不滿。在一個無法推動新政策的社會變遷期間，除了應顧及傳統政治文化特性外，領導人也應該要建立符合制度化、程序化以及合法化的機制，從行政方面，藉由忠誠與有紀律的領導階層的帶領，使政府和總統兩者能在專業行政和權限的劃分更為清楚。只有當行政權限能合理劃分時，國會、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才得以正常發展。正如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言，在一個新國家中建構新的體制比舉行選舉更為迫切也更為重要。這並不是要俄羅斯放棄民主，而是如果希望民主在俄羅斯開花結果，它就必須先被建構成一個自由的國家。⁶¹

普欽鐵腕推動中央集權

⁵⁹ Vladimir Shlapentokh, "The Four Faces of Mother Russia", *Transition*, 4,5(Oct.1997): p. 63.

⁶⁰ Правда, Март. 24, 1998, с. 1.

⁶¹ Eugene Huskey, "Yel'tsin as State Builder," *The Soviet and Post Soviet Review*, 21, 1(Nov. 1994): pp.56- 62.

2000年3月20日普欽(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贏得俄羅斯總統選舉。他爲了加速經濟改革，穩定社會秩序，防止分離主義蔓延，並圖恢復往日大國地位，對內對外所展現出來的施政理念是強調重建中央集權政治。5月8日，普亨正式接任總統之後，於5月13日下令將俄羅斯聯邦分設七大聯邦管區，分置總統全權代表，其職權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在內，一舉將地方政府權限壓縮在中央政府派任的聯邦管區之下。主要任務包括：

- 〈一〉調整轄區內聯邦機關活動，監察檢警司法狀況，向總統提出建議案。
- 〈二〉與聯邦主體所轄地方經濟主管當局共同擬訂區內社會經濟發展計劃。
- 〈三〉監督轄區內聯邦法律、總統令、地方政府執行情形。
- 〈四〉對轄區內國家機關間之對立進行調解。
- 〈五〉轄區內各主體的法律若抵觸聯邦法律，或聯邦政府與外國政府簽署的國際條約，或侵害人權之時，可向總統提出糾舉與懲罰。

普欽在7月8日首度發表國情咨文演說，強調指出：俄國只有維繫強勢、一統的中央政府，才能扭轉提昇國力，確保俄國人民福祉。國家權力集中在中央政府可防止各地分離主義蔓延及地方首長的侵權，確保廣及11個時區的領土內企業營運環境。俄國必需成爲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以防範國際恐怖組織侵犯，包括車臣獨立運動，防止國際社會藉人道主義偽裝遂行侵犯俄國國家主權。俄國也將致力保障公民各項權利與自由，但對部分媒體公然被濫用作爲個人營利工具將強力限制。⁶²對聯邦院議席將朝向政府派任方式，不再由各主體首長兼任。

稍早5月15日時，普欽向杜馬院提出3個法律草案：一是改組聯邦院，廢止由地方行政、立法首長兼聯邦院議員制度，改由政府派任；二是對違反聯邦法律的地方首長可予停止職權；三是總統可根據聯邦法院裁決，對被認定通過違反聯邦法律的地方議會行使解散權。這些提案除第一案修正爲由各主體行政立法部門選派專任外，全部已於2000年7月26日經聯邦院通過。⁶³普欽總統上台迄今，強力推動俄羅斯的政治體制走向強勢中央集權，更甚葉爾欽在1993年新憲法下的強勢運作。

參、俄國政治發展之檢證

本章檢證俄國之政治發展，除本文所提三位沙皇外，重心主要將針對近十五

⁶² 6月，俄政府逮捕媒體大亨古新斯基，此人是莫斯科市長魯茲科夫幕後金主，政商關係良好，顯示普亨的決心

⁶³ 俄羅斯媒體對普欽的強勢寡頭統治所做民調，結果顯示有46%受訪者支持，僅26%反對。見 <http://www.russiatoday.com/poll.php3>.

年來的俄國政治發展模式，提出進一步之綜合探討。

俄國學者普列柯尼辛(Аркадий И. Прикозин)認為，在俄羅斯歷史中，政治領導人的政治支持基礎來源有五種。一是透過繼承 (inheritance)，因為他是執政者的下一代或者是與之有血緣關係的人，如歷代沙皇；二是透過暴力奪取 (usurpation)，如布爾什維克黨人；三是透過妥協讓步 (concessionary type)，以戈巴契夫為代表，亦即在維持現有體制的前提之下，對於體制作改革以應付將來可能的變化；四是反抗型 (inversionary type)，以葉爾欽為代表，他獲得支持的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並不是因為他的理念或作為，而是因為他受到前任政權的打壓；最後則是建設型 (constructive type)，受支持的原因是因為他能提出有積極貢獻的計畫。⁶⁴目前普欽的政治支持基礎則屬繼承型和建設型的綜合。

歷史上改革者面臨的困境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他在調和保守與激進兩派時，需要有相當的政治技能來控制住這些力量。第二，改革者需善於操縱社會力量，控制社會變遷，以免產生突發的、重大的社會變化。第三，面臨改革目標孰輕孰重、誰先誰後的優先順序抉擇，亦即在社會—經濟與政治改革問題上，改革者較難於做出一個平衡兩派的決定。⁶⁵而俄國歷史上歷代沙皇與主政者在推動改革之際，也都面臨這些問題。大權在握且能控制各種不同政治或社會力量者，如彼得大帝、凱薩琳大帝。能調和貴族與平民間不同力量推動改革者，如亞歷山大二世。善於審定時勢，在面臨重大困境與社會重大變遷即時提出完全不同政治發展模式渡過難關的如列寧。面臨改革而無法調和激進與保守兩派力量，對改革目標又舉棋不定，缺乏操控社會力量，終致失敗的戈巴契夫。葉爾欽雖然以新憲法為盾牌，但對社會突發與重大變化乏力應付，尤其無法導引反對力量支持其經改，致十年任內社會經濟始終未有起色，空有「超級總統制」之行政大權。目前端視普欽總統，如何在中央集權運作下，起衰振蔽。

俄羅斯在選擇其政治發展過程中，涉及一個相當嚴肅的有關課題，就是俄國歷史意識的危機問題。俄國數百年來由於一直在追尋其宏偉的默西亞的救世觀與大俄羅斯化等理想，而集中所有的力量去企圖達成目標，但是當那些目標再度成為空想時，亦即當俄國人面臨分離運動或民族主義問題時，就立即勾起俄國歷史的舊創傷，而且在舊傷口上再度流血。從 18、19 世紀時期西化、斯拉夫化的論爭，到 20 世紀時期共黨政權的建立與崩潰，在在顯示俄國人在選擇其國家發展

⁶⁴ Arkadii I. Prigozhin, "The Pathologies of Russia's Political Leadership",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35, 49(July-August, 1997): 6。

⁶⁵ 杭廷頓著，聶正雄、張岱云、石浮、寧安生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台北：時報文化，1994〉，p. 355-6。

的道路上相當坎坷，近代各國罕有像俄國般，迄今仍陷入歷史意識的二元或「分裂」的矛盾情境。⁶⁶

彼得大帝集中所有力量，強制推動西化改革，政治上自然走上專制主義體制，以致與人民疏離；凱撒琳大帝為將俄羅斯建成歐洲一流強國地位，披著開明外衣，實則更強化其專制統治，將俄國人民自卑感與人民對統治者間之疏離感升高到極限；亞力山大二世雖然解放農奴，但政策卻在農奴與貴族地主間、保守與改革間、東西文化衝擊間、封建與資本主義間、政治寬容與壓制間搖擺不定，反成其後農民革命動力；通過暴力奪權成功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列寧，則在其無產階級專政下將社會主義體制強施於俄國人民身上，史達林時一黨專政極權獨裁將之發揮到極致，直到戈巴契夫時才有了轉變。換言之，俄國歷史中一直存在的各種矛盾紀錄，在多個不同時期一再呈現。

對戈巴契夫之檢證

1989年，戈巴契夫訪問中共，親眼見到中國的天安門事件，使得原本對改造充滿自信的戈巴契夫，開始面臨幾條道路之選擇。第一條是持續由上而下的改革。東歐及蘇聯的要求改革潮流已經朝無法控制的方向前進，因為百姓參與的改革是朝向破壞社會主義與共黨權威性統治的方向前進，改革是在放棄社會主義的口號下進行。第二條則是向人民顯示維護社會主義體制的意志，對民主化運動進行武力鎮壓，重新確立共黨統治權威，恢復國家秩序，一切改革都在社會主義體制內進行。

但是，戈巴契夫認為蘇聯應該是既不向左的第一條道路，也不是向右的第二條道路前進。而是繼續向前「改造」的第三條道路。他認為第二條道路是會抹煞朝向改造之路所付出的心血，而1989年後期所發生的東歐民主化浪潮也證實了第二條道路是不可行的。此外，戈巴契夫認為在第一條道路與第三條道路之間應可以找到若干相聯繫的小徑。但是，蘇聯卻存在著切斷第一條道路與第三條道路的鴻溝，這就是對中共較不成為威脅的民族問題。俄國歷史上的大俄羅斯化和民族自決衝突問題再現，而隨著民族獨立運動之高漲，戈巴契夫在90年代後期也不得不在第二條與第三條道路間之小徑朝向第三條道路繼續前進。現在看來，第三條道路或許在1987或1988年時還存在，但是到了89年隨著波羅的海三小國獨立之呼聲越來越高漲而不復存在了。⁶⁷

⁶⁶ Igor' N. Ionov, "The Crisi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Russia and Ways to Overcome it", in *Russian Studies in History*, 36, 1(summer 1997): pp. 80 -1.

⁶⁷ 參考郭武平，論戈巴契夫的「改造」：理想與實踐，p. 196-8。

1990 年之後，戈巴契夫並未積極朝向第一條路前進，只是拒絕朝第二條路前進。因此，戈氏與改造也因為向左的勢力與向右之勢力均等而呈現靜止的原地踏步情形。表面上看來改造在蘇聯是靜止的，但是此種雖然靜止卻又持續放出改造活力的做法，無疑是一個隨時會爆炸之巨大蒸汽壓力。「八月政變」提前使之引爆，對戈氏而言，「改造」工作功虧一匱。

就本質而言，蘇聯在改革中實行的意識型態多元化，實際上就是放棄了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領導地位。從 1985 年到 1987 年的蘇聯改革仍屬體制內的改革，自 1988 年以後蘇聯的改革便完全跨往整個體制轉換的方向，即是以否定現實社會主義為起始點。戈巴契夫所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和「民主化」、「公開性」、「新思維」，以及宣稱「結束意識型態的壟斷」，改變了舊有的社會主義基本思想和政治路線，結果造成了社會上反共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斯主義的思潮氾濫。意識型態領域的嚴重混亂，導致了整個社會喪失了對共產黨領導的遵服與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戈巴契夫改革的速度則是「政快經慢」。在蘇聯社會要全面投入民主化的同時，大規模的經改計畫也著手展開。但與急速的政治轉型過程相對應的卻是進展緩慢、舉步維艱的經濟轉軌進程。社會普遍政治化後，民眾的政治熱情並沒有轉化成經濟轉軌的推動力，相反地，各種政治勢力、政黨沈醉於政治鬥爭，很少提出具體的、系統的經濟改革方案。一些政治勢力甚至成為「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即一切以反對政府政策為行為準則。⁶⁸紛亂的政治鬥爭分散了政府與社會對經濟轉軌的注意力，一方面國家必須為轉型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另一方面由於政治的不穩定、社會的動盪不安使得改革的成本倍增。蘇聯政治民主模式的實行反而成了經濟轉型的羈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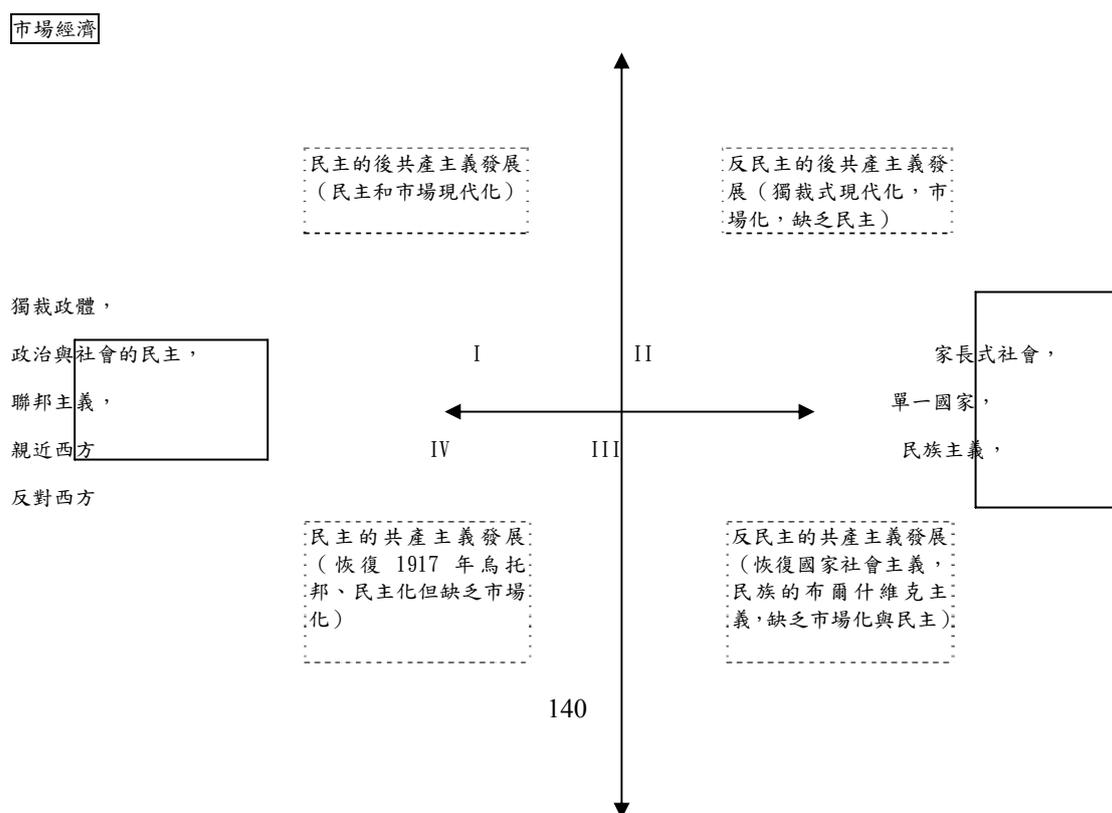
正如美國學者達林（Alexander Dallin）指出的：經濟穩定和私有化需要持久的政治支持和具「鐵腕」（ironhand）的國家政府機構。⁶⁹蘇聯社會在戈巴契夫多元化政治改革的鼓勵和縱容之下，敵對勢力公開地、合法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並要求實行多黨制。伴隨著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來的結果是：政府的行政能力與政策的落實程度大為削弱。不僅政府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控制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一切失序的現象，政治體制的轉軌還對政府實施的各種計畫造成了牽制，難以貫徹，甚至是徒具空文。在整個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是否能有一個堅定有力的政府來發揮穩定經濟，必要時能有效地執行緊縮政策、控制通貨膨脹，是十分重要的。戈巴契夫所領導的政府缺乏穩定的政權，是一個中央政府權力正在崩潰中的國家，缺乏對整體經濟的調控能力，經濟改革的秩序必然紊亂不

⁶⁸ 姜毅，「社會轉型與俄羅斯政治發展模式的選擇」，*東歐中亞研究*，30。

⁶⁹ Alexander Dallin, "The Prospects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 in Russia" in Alexander Dallin ed., *Political parties in Russia*, p. 89.

堪。在能力薄弱的政府之下，經濟轉軌中的失誤和弊病成爲敵對勢力煽動群眾、制造動亂的最佳利用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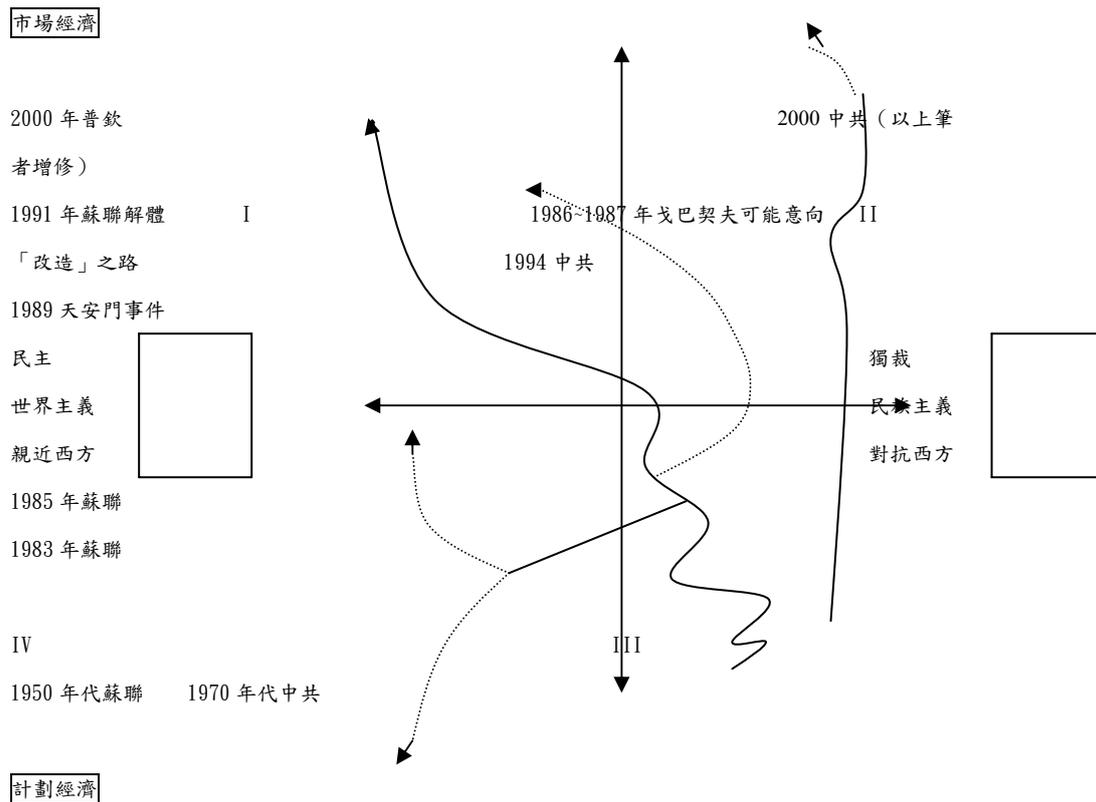
前俄羅斯國家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比較政策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登（Leonid Abramovich Gordon）認爲戈巴契夫上台之初，蘇聯有四個基本的國家發展戰略方向可供選擇：（圖一）經濟上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兩個方向；政治上是獨裁和民主兩個方向。從兩極端方向建構出四種可能性組合供作選擇。其後，戈巴契夫所選擇的「改造」之路，（圖二）是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方向。但是邁向民主的政治發展速度高過於走市場經濟發展的速度，結果蘇聯在 1991 年解體。反觀中共，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仍持續其「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四個堅持」的一黨專政路線，在政治穩定的前提下，社會經濟發展獲得相當成就。立即引起世界各國人士注意，並進而紛紛針對全球人類歷史發展變動展開探討，尤其是對所謂社會主義體制國家的中共和俄羅斯，在轉型爲自由市場經濟之際，對政治發展模式的不同選擇所產生的差異性。雖然迄至目前，中共的選擇似乎是暫時讓轉型中的中國人民避免了俄國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但是其政治發展仍是一嚴肅未決的課題。



計劃經濟

圖一

參見 L. A. Gordon and N.M.Pliskevich, “Crossroads and pitfalls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September~October, 1995, p.11.



圖二

參見 L.A.Gordon and N.M.Pliskevich, “Crossroads and pitfalls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p.15.

對葉爾欽之檢證

有位日本學者在 1992 年指出，葉爾欽政權在當時面臨著三大課題：危機管理、市場化與民主化。而這三大課題無法同時完成，它的優先順序依次為：(一) 危機管理; (二) 市場化; (三) 民主化。同時追求三者是錯誤的。他認為，危機管理就是確立秩序、追求安定。權力鬥爭與權力真空都是有害的，奠定安定的法治社會才是最重要的。市場化是追求經濟效率化，安定並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看出成效。民主化應包含尊重人權、言論自由化、確立議會民主和自由社會。而在民主化之前，極可能招致混亂、無政府狀態，所以不將它放在最先。⁷⁰而吾人觀察葉爾欽任內，遇有國家重大事故需做決策時，常是以危機管理為優先考量，93 年府會衝突，96 年二輪總統選舉，98 到 99 年的連串改組政府，的確是驗證了上述觀點的正確性。

當然，這部號稱是為葉爾欽量身定做之憲法，賦予了俄羅斯總統超乎西方總統制國家的總統更多、更大之權力。這對俄羅斯的政治發展是有利，抑或是有

⁷⁰ 禰田茂樹，「葉爾欽同時追求改革課題是錯誤的」，*世界週報*(日本)，1992 年 9 月 8 日號，p. 6，轉引自尹慶耀，「俄羅斯的經濟問題」，*問題與研究*，31, 12(Dec. 1992): 39。

害？人們對此看法不一。如學者懷特(Stephen White)指出，俄羅斯的總統制的缺失有三：

- 〈一〉總統制的成功與否皆取決於總統個人，俄羅斯總統制在這方面更是如此。
- 〈二〉總統與議會之間複雜與對立的關係是總統制的一個特徵，其他國家的總統與議會透過議會內之政黨可建立聯繫與協調關係。但是葉爾欽聲稱代表全民利益而未屬於任何政黨，使得衝突機會較多於他國。
- 〈三〉俄羅斯政府總理之提名掌控在總統手中，但是總理任命需由議會通過並對立法部門負責的結果，讓總理可能陷入兩難之中而動彈不得。⁷¹

但是，俄羅斯獨立報（*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主編維塔利·特里季雅科夫（Третьяков В.）則指出，總統手中不僅握有影響國家和社會、直接控制國家和社會的有效工具，亦即人事命令權；他能在幾分鐘之內進行政府改組，從而也能根本改變整個國內政治力量的平衡。這樣看來，總統的過大權力在目前似乎有明顯的缺失，但相較於保證政治穩定這一個確保向民主政治過渡的必要條件來看，又屬於次要的問題。同時，新憲法規定的權力制衡、輿論監督、司法獨立等等皆對總統權力有所制約。⁷²

此外，從葉爾欽 93 年以來之政策方向來看，很明顯的隨著幾次大選下來，反對力量逐漸有增強之趨勢。雖然從人民在 96 年大選中最後仍選擇了葉爾欽，但是在第一輪選舉過程中葉爾欽與共黨候選人朱加諾夫差距僅約 3%，無啻對葉爾欽陣營之一大震撼，也使得他更積極拉攏中間勢力列別德，才獲得最後勝利。事實上，葉爾欽從早先的採取西方路線之激進改革，進行震撼療法與自由民主化，逐漸地修正適合屬於俄羅斯國情的政策，如外交政策上強調俄羅斯是屬於歐亞大國的主張，俄羅斯的國徽為面向東西方的雙頭鷹；經濟政策上，從強調激進市場化改革到穩定經濟為優先順序，並採取共黨或其他黨派之主張；以及選舉法之修正上與國會進行多次妥協對話中，可以看出縱使擁有憲法上的優勢地位，葉爾欽仍繼續朝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邁進。⁷³因此，總統與議會

⁷¹ Stephen White, "The Presidency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in Peter Lentini ed.,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Order in Russia: The implication of the 1993 Election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8 - 221.

⁷²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Окт.5,1996, с. 1.

⁷³ 葉爾欽於 1998 年 3 月 23 日突然宣佈將總理契諾米丁的內閣除了兩三位部長外全部免職，其後於 27 日提名年僅 35 歲之季里年科（Sergei Kiriyenko）接任新總理。其理由是為確保經濟改革順利推動及為了民主人士贏得公元兩千年總統大選。葉氏對推動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改革發展已成定型模式。

雖有不同的政策主張，但他們的競爭都是在憲法的體制內所進行，即便是共黨人士也聲稱不會回到舊蘇聯的一黨專政體制。

對普欽的檢證

1999 年俄羅斯國家杜馬代表改選，國會生態丕變，支持現總統普欽者成多數，俄羅斯政局已逐漸趨於平靜，各黨派之間相互制約的機制也逐漸形成。在社會上，人們的心態開始從浪漫理想轉向現實主義；從社會偏激的情緒轉向社會溫和的情緒；從茫然不知所措轉向在社會中尋找自己的定位。對於未來俄羅斯政治模式的選擇，有三個可能方向：(1) 重新選擇極權模式；(2) 選擇菁英—權威模式；(3) 走向民主政治發展模式。依目前俄羅斯的憲政體制設計，因賦予總統極大權限，在普欽總統強化中央集權，企圖恢復往日大國地位目標下，雖然更傾向菁英權威模式。但是普欽面對俄羅斯廣闊土地和民族主義壓力，他希望走向民主開放道路，但又呈現中央集權的專制傾向，這也是一種矛盾面。唯基本上，還是在現行憲法體制下運作，政治發展方向應該不會有太大之轉變。

肆、結語

探討俄國史上歷任主政者面臨國家政治發展方向的關鍵時刻，可以發現俄國的政治發展模式，常受其歷史傳承、政治文化，或社會變遷等因素的影響。而彼得大帝、戈巴契夫和葉爾欽時期的政治發展模式更是受外來西方政治模式的影響。其間，歷代主張改革的主政者，本身之主動有意選擇，更是決定政治發展模式的最後關鍵者。⁷⁴本文所特別提出探討的彼得大帝、凱薩琳大帝、亞歷山大二世、列寧、戈巴契夫、葉爾欽和普欽等人主政下的俄國，在關鍵轉型期時，其政治發展模式，幾乎都受這些因素的影響。

俄國於 1917 年大革命後，選擇一黨專政與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對過去沙皇時代傳統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產生重大轉變。⁷⁵經過 70、80 年的發展，俄國人民也逐漸適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生產分配原則。但是分配的不足加上對極權獨裁一黨專政體制的不滿，在戈巴契夫上台後展開的「改造」工作下，加速不滿

⁷⁴ Robert B.Ahdieh, *Russia'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2.

⁷⁵ 俄國學者Lurii Nikolaevich Davydov認為：「我認為我們只有一個革命，開始於 1917 年 2 月結束於 1917 年 7 月。」參見Luril Nikolaevich Davydov,“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hodological Crisis in Historical Science”, *Russian Studies in History*, winter 1996-1997, p. 22.言下之意指俄國產生於 1917 年二月的革命，本來即將給俄國帶來完全不同的政治發展模式。但是十月革命又將俄國帶回原本沙皇體制下的專制統治方式，而不認為「十月革命」是一場革命。

情緒的爆發，在社會、經濟、民族等多重壓力下，蘇聯突於 1991 年底解體。讓獨立的俄羅斯在俄國社會經濟與政治體制上又面臨另一次的轉變。⁷⁶俄羅斯在政治上選擇了民主政治發展模式，經濟上，打破舊有生產分配結構與整體社會經濟秩序，走向自由市場經濟與私有化的經濟發展模式。

戈巴契夫爲了推動經改需要，而先從政改下手。當他因改革政黨的體制，失去傳統與法理性權威，但是又缺乏取代傳統權威之任何工具，面臨變遷快速的社會，戈氏缺乏維持社會穩定與維持國家發展的統治力量，其所選擇之政治發展模式，雖廣獲世界各國稱頌，但是當手中缺乏強有力的統治工具—權力時，在面臨國內一連串社會運動事件與身邊左右兩派人馬互鬥之際，也乏力壓制，只能站在「改造」的十字路口上，帶著俄國人普遍存在的矛盾心態，任憑事件持續發展惡化，因此在經濟改造乏力推動停滯不前和民族問題的推波助瀾之下，最後只能面對國家解體，結果被自己所選擇的政治發展模式拋棄。

葉爾欽鑒於戈巴契夫前車之鑑，在 1993 年與人代會爭奪國家發展主導權中，毅然選擇以炮轟國會手段，徹底解決府會之爭。其後並大力修改憲法，擴增總統的職權，期能充分主導國家發展方向。在 1993 年新憲法架構下，俄羅斯的政治發展模式有了全新的改變。葉爾欽透過總統職權，以各種形式手段掌握政權力量，全面推動他「民粹式」的政治發展模式。亦即俄國人又選擇了與俄國長久以來歷史傳承和政治文化有關的「半總統制」，總統權力凌駕立法權之上，遠超過美法等國的總統制。俄羅斯在葉爾欽的帶領下，社會經濟、政治同時產生巨大的轉變，而與此巨變同時，民族主義又成爲後蘇聯時期團結全民的特殊產物，爲多數人民與各種政治團體勢力普遍認同。爲俄羅斯未來政治發展提供與其歷史文化相對應的理論基礎。俄國人民賦予總統超級的權力，而又一度選擇將國會立法權交給共產黨與民族主義份子手中，證明過去民族精神（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或大斯拉夫主義（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對俄羅斯政治發展的交互作用。

1998 年 3 月葉爾欽將總理契諾米丁（Ченомырден В.С.）內閣以推動經濟改革政策不力爲由，全部免職，到 1999 年底退位給普欽代理總統，其間任免新總理，改組政府等一連串大變動，雖然是憲法所賦予總統職權，但也顯示葉爾欽所選擇的威權式政治發展模式，仍擺脫不開俄國政治文化中專制主義的沙皇情結，這同時也顯示在現有憲政體制下，較有利於葉爾欽維持社會穩定與推動整體國家發

⁷⁶ 俄羅斯學者 Anatoly M. Khaznov 針對 1991 年底的蘇聯解體，認爲：「俄國革命尚未發生；因爲基本上仍是原班人馬在台上統治俄羅斯。」參見 Anatoly M. Khaznov, *After the USSR*, (U.S.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p. 75. 這些不認爲十月革命、蘇聯解體是一場革命的觀點，是從歷史大視野看俄羅斯的政治文化中，專制體制情結仍揮之不去，而提出的另類思考。

展。在面臨選擇政治發展關鍵時刻，他仍是以危機管理為第一優先，高於市場化與民主化。

政治發展亦如科學，重要的是對政治體制建構運作的批評性討論及其付諸經驗的檢證。回顧俄國歷史，從東正教的引入，到彼得大帝、凱薩琳大帝與亞歷山大二世，再到列寧、戈巴契夫、葉爾欽等人，在對內施政上政策目標都是以改革體制，以改善民生與國家生存發展為目的。政治發展轉捩期中之體制建構運作，常夾雜在改革或保守的爭議中。但其間有一共同特點，國家領導者都希望保持中央威權體制，以利推動改革工作。

從俄羅斯 1993、95、96、99、2000 年 5 次全國性大選投票結果觀之，俄羅斯人民選擇的政治發展模式，最大特徵就是左右兩翼在後蘇聯時期之突起，以及民族主義、大俄羅斯主義的抬頭。一方面凸顯出俄羅斯傳統政治文化兩極性的矛盾特質外，也同時證明了俄羅斯民族的特有民族精神仍普遍深植俄人心中。俄羅斯學者所言：「從解體前的離心分裂走向目前的向心力之歷史腳步，對俄羅斯的未來是充滿樂觀。」⁷⁷充分展現出俄羅斯人對於恢復國家以往光榮，喚醒民族精神的歷史情感。尋求恢復民族精神確是俄羅斯民族的期望，但是相信俄羅斯人民是不願見到因此而導致一個已邁向民主政治之政治發展方向，走向循環的歷史道路。

⁷⁷ Nicolai n. Petro, *The Rebirth of Russian Democracy*,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 182.